

海 外 学 林

自我的他性

——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

The otherness of self [美] 流 心 著 常 姝 译

—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Xin Liu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外学林

自我的他性

——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

The otherness of self [美] 流心著 常姝译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Xin L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 / (美) 流心著；常
姝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The Otherness of Self

ISBN 7 - 208 - 05155 - 0

I. 自... II. ①流... ②常... III. 民族性 - 研究 -
中国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383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李卫



世纪文景

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

[美] 流心 著

常姝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3

字 数 165,000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8 - 05155 - 0/C · 176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前言与谢词	1
文本注释	9
第一章 尼桑之舞	11
第一部分 B市的故事	25
第二章 故事中的人物	27
何为人物?	28
故事里有谁?	32
三位人物:处长、老板与小姐	35
第三章 欲望的剧场	50
总经理办公室	50
甲鱼宴	53
卡拉OK	56
“看不见的手”与按摩房	59
第四章 快乐的写作学	65
人类经验的叙事本质	65
B市故事的形态学	78

目 录

CONTENTS

第二部分 对“我们”的追问 95

第五章 自我的结构 97

“自我的根源” 97

成为他者 116

第六章 时间、叙事与历史 122

过去的时间 125

革命时期的时间 130

革命后的时间 135

今日之今日性 144

第七章 生成的存在 146

“存在与虚无” 146

主体、主体位置与主体性 152

结语 对未来的记忆 159

参考文献 161

前言与谢词

作为一本“当前史”的民族志，本书编写了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如福柯所述，现在的历史是解构而后建构的行动，是将理论和故事的原有要素投射到当下的智识背景中。这就好比当（富裕的）族人新修的祠堂形成一种崇拜、进而促使家族发生新的分化之后，华南家族组织的重修系谱。我借助自我系谱这一术语，来考察当代中国情境下，在自我呈现的“联结结构”内部发生的错位。^[1]自我呈现——可宽泛地理解为追问“何为善好（生活）”——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可能性所依生的道德空间，同时又被这个空间建构着。

我认为，中国当前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地震。我们虽不知道有多少善恶之厦将土崩瓦解、未来的道德面貌又将如何，但足以确定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象将有别于以往几十年的情形。我试图捕捉这变化，探寻新中国善好（生活）之本的转换，追述人们的理想，并重点解析浮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一种特殊的时间概念。本书浅略描绘了一些新近出现的人物，其所凭依的伦理基础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既熟悉又陌生。

这背景是诸种历史力量的存仓。这些等级性的、弥散的力量至关重要，维系着组织与制度在日常实践中的权力。它们环环相扣，又存高下之分、主

[1] 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使用“联结结构”来指称“特定历史情境下文化范畴的实现，这由历史行动者的利益行动来表达，包括探讨其动机的微观社会学研究” (Sahlins, 1985, xiv)。正如萨林斯本人所述，虽然用词相近，这与布罗代尔 (Braudel) 所使用的“联结的历史”存在差别。我此处的用法与布罗代尔更为接近。有关该术语内涵的基本说明，参见 Braudel, 1972, 2: 892—900; Braudel, 1977, 1980。对年鉴学派引领的法国史学革命以及其中布罗代尔的地位的一般评论见 P. Burke (1990)。

从之别，彼此互不对等。在每一种力量的内部，集结着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作为其中的构件，这些要素形塑出了特定的力量。各力量的结合又进而组成既定历史时刻独特的社会体系。在某时某刻，所有可能的力量衍生出了某些要素，自我的结构便是这些要素在特定历史处境下的（再）结合体；自我系谱由几个结构整体一统而成。本书的宗旨，即捕捉这些要素与力量在当代中国的（再）结合。

本书力求提供关于现代中国经验的人类学解读，并以一种正在生成的特定存在模式作为论述的核心。就理论旨趣而言，这是我的前作——《在自己的阴影中》（Liu, 2000）——的续篇，只不过主题有别（那是对陕北农村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民族志考察）。现代中国经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仍是一团迷雾，解谜的工作迫在眉睫，这不单纯是“另类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迈向对我们自身的本体论诠释必走的一步，并且是以深厚的历史感为前提。因此，这本质上是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77: 128）所说的“情感结构”的历史考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在改革后的中国社会甚为流行；与此相反，我关注的不是转型的物质条件，而是话语空间的构型，它影响着那些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故事得以讲述的方式。

在经验层面上，令人困惑的是，中国社会似乎拥有某种神力，能够出其不意地自我改换，来回换挡，屡变方向。尤其是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时期，在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的领域，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一位颇有潜质的年轻物理学家竟在一年之内转而从商，去经营肯德基店，这或许会让人类学家们大跌眼镜。令人愕然的不是人们改换职业，而是随之而来的性格变化。我把这种人格上的断裂称作“自我的他性”：本书即有关当代中国人自我的他性的民族志阐释。

本书是以 B 市这一华南沿海城市的商业实践逻辑作为研究对象，经验材料取自一家业绩斐然的高科技公司。城市由开放的空间构成，迥异于乡村共同体——长久以来，在有关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这里是田野调查的传

统场所。^[2]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广泛地渗透到华南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城市空间日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我的写作主题虽在空间上有所定位，但却不是地方性的，因为它找寻的是单纯一个共同体所无法体验的社会存在得以可能的条件。就方法论而言，本书是一项民族志理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观察。

对中国的城市问题予以研究，背后潜含着更为普遍的对于人类学知识本质的理论关怀。^[3]一些外行人士津津乐道的偏见与学科惯习不过是智识上的幻象，触及人类学知识本质的基本问题仍悬而未决。1998年在日本调查期间，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有关现代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其民族志经验意义何在？在日本，社会纽带的传统形式（譬如社区联结）不再对文化生活的组织发挥核心作用，我开始思考如何进行以城市空间为分析对象的田野工作。本书或明或暗地对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模式提出批判，在这里，民族志描述的焦点不再是人们的实际经验，而转向阐释他们所讲述的有关自我或他人的故事。部分原因在于，商业实践的很多方面是不可直接观察的。例如，目前在中国，没有一个商人会把人类学家带到由市长签署一笔交易的餐桌上来，因为个人性的受惠需要回避第三方。这个例子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中国（华南）的大多数商业行为的确是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志写作仅仅意味着聆听由当事人讲述的故事。如果经验这个术语依然适用，我想把它界定为某种嵌入在评述、记忆或想像中的东西，它业已成为对曾经发生和未来将有之事的解释。本书将以这类民族志材料为主，试图描述人们想成为

[2]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访问北京时，结构功能主义之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最早正式提出，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考察的最佳场所应是村庄。对这一主张的简要评论及这种研究的一个例子，见费孝通的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经典著作(Fei, 1939, 特别是第4—5页)。西方传教士曾写就大量关于中国村庄生活的早期著作，例见A. H. Smith, 1899。

[3] 以往20年间人类学界围绕田野作业与写作展开的争论，参见Rabinow, 1977, 1986; Boon, 1982; Fabian, 1983; Sperber, 1985; Marcus & Fischer, 1986; Clifford, 1986, 1988a, 1988b, 1988c; Sangren, 1988; Geertz, 1988; Fardon, 1990; Stocking, 1992; James, Hockey & Dawson, 1997; Gupta & Ferguson, 1997。

什么样的人，而非他们实际做了些什么。我希望透过这些故事去把握未来的历史。在我看来，人类学家可以借助人们所讲的故事，来理解他们如何感知自我与整个社会。这种关注点的转换牵连看更大的理论关怀，即把叙事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追随这样的理论旨趣，本书主张认真地思考叙事对于构建现实与经验有何意义，以此重建人类学分析的根基。特别应予说明的是，提出叙事的问题，并不只是要澄清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存有社会与文化差异，而是要追问叙事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申明重视人类存在的叙事特性的理论立场：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成为什么，取决于我们所能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真理是局部性的，民族志亦复如此。如果有人（特别是不熟悉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读者）质疑本书所描述的商业生活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华南）的全貌，我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称的“家族相似性”来作说明：本书只是整个变迁过程的个体化呈现，是历史过渡期的一张快照，是分支众多、世代交替的家族中的某个人。人们可以说，若以父系而论，此人的长相和叔叔有几分类似，但或许他的舅舅却从其面容里看到了另外的轮廓。民族志就好比此人，坐在他的面前，读者可以不受书本内容的限制。作为家族相似性的示例，民族志很好地体现了人类学的想像力。

人类学家常说，他们是以社会（或文化）系统作为分析对象；然而，社会本身的定义却不甚明了。“人类思想完全是社会的：它的起源、功能、形式与应用皆是社会的”（Geertz, 1973: 360），对于格尔茨的这段表述，几乎无人反对。但我们无从解释当代世界中“社会”的意涵，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术语只是用于否定社会科学——尤其是生理学与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或还原主义取向，反对把个体视为一切的根源。格尔茨接着论述道：“思考根本上是公众活动——其天然的栖息地是宅院、市场与市镇广场。我的关怀在于，这种行为对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来说，含义杂多、微妙而且未被充分理解。”（Geertz, 1973: 360）我们可以看出，这句话暗含维特根斯

坦晚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对私人语言观的精彩批判。^[4]照此看来，格尔茨是把社会的领域界定为意义的领域。^[5]然而，就中国（华南）的城市发展而言，实际上越来越难于把社会定位到宅院、市场或市镇中心。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社会与意义？^[6]参考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戴维·卡尔（David Carr）等人的著作，我认为，社会必须定义为一种关系，这使得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得以表述为“我们自己”。这种关系是有意义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本质上具有叙事性。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特性即是难于以连贯的方式表述个人自身与“我们自己”的关系。^[7]本书将探讨这种现象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 B 市一家高科技公司成长的故事。B 市位于中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的经济发展相当缓慢。提起华南的发展，人们首先会想到广东、海南、福建和上海等地区。^[8]但我认为，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亟待研究的后发展地区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均衡地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渗透作用。我想透过这家公司（BX 集团）的成长经历，来

[4] 格尔茨后来在注释里提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学说（Geertz, 1973: 405, n.45）。关于意义理论的一般论述，参见 Taylor, 1985。

[5] 格尔茨明确指出：“文化是公共性的，因为意义是公共性的。”（Geertz, 1973: 12）

[6] 例如，明茨（Mintz）在驳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关于食物意义的符号学取向时曾说道：“就餐是社会性的，涉及沟通和予取、对共识的寻求、对个人需要的共同感受、通过照顾他人的需要而妥协。”（Mintz, 1985: 201）这里，我的关注点不在于哪一方对食物意义的分析更为可取；我想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即明茨对社会的定义过于含糊以至于无法运用。

[7] 利奥塔（Lyotard）将后现代界定为“怀疑元叙事”，“叙事的功能丧失了它的功能要素，丧失了伟大的主人公、危险、旅程与目标”（Lyotard, 1984: xxiv）。我认为对于中国（华南）人而言，这种生活状态引致道德或伦理问题。如我将要表明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评说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只是有心无力。

[8] 近来有关华南经济改革的精彩研究，参见 Lee, 1998（有关深圳女工）；Hertz, 1998（有关上海证券市场）；Hsing, 1998（有关华南的台资引进）；Wank, 1999（有关厦门企业主）。

捕捉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揭示复杂的投资结构——它所触及的，不是技术和知识因素，而是社会和政治资本。本研究的一大背景是，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宣称，国家的未来取决于高科技工业的发展。由此，各省设立特区并制定特殊政策。在第一章，我以外地人的身份介绍这座城市以及身处其中的感受，说明 B 市高科技发展的经济与政治背景；第二至四章描写 B 市故事中的人物，概述其情节编排的典型模式，分析这些有关商业与社会的故事所对应的叙事结构，提供对 B 市城市（高科技）发展故事中人物与情节设置的民族志描述。本书第二部分继续交代故事的细节，并且申明前一部分所潜含的理论关怀。第五章对理论层面的自我结构加以界定和描述。通过阅读大量的人类学与哲学著作，我对自我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而为本书的民族志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六章把日常的时间概念作为自我建构的核心要素，并指出，可将现代中国经验的三种历史时刻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三类时间构型。第七章讨论主体性，为进一步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主体与主体位置的问题，梳理理论空间。结语中，我转向记忆问题，指出在中国（华南）的商业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型人物，他失去了记忆，无法言说“我们”。在国家代理人的鼓励与扶持下，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实践的社会生活之间日渐疏离。我想要书写的，是表达“我们自己”的困难，是官方世界与商业生活世界之间的断裂，是已然存在的未来。

首先要感谢那些在田野工作中帮助过我的人们。他们不仅提供情况，描述自己的生活，同时倾吐梦想与愿望。因此，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并不是人类学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提供者，在讲述自己与他人的故事时，每个人都个性纷呈。这种坦露使我得以了解他们，也给我这样一个云游各地的田野工作者带来了稍许改变。

在学术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专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先生，对我的思考与学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从我 1995 年获得教职以来，伯克利人类学系一直予以我智识上的激励，各位同事与我分享灵感，展开论辩，从中我受益匪浅。在此谨致谢忱。将这些同事与朋友的名

字一一列出，标示着我近年来心智成长的轨迹，他们或评阅本书的部分章节，或激发我思考更为广阔的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问题，或为我营造高效率的工作环境，或在调查期间鼎力相助，着实令我感动。他们包括：Gerry Berreman, Stanley Brandes, Timothy Brook, Meg Conkey, Robert Culp, Prasenjit Duara, Alan Dundes, Dru Gladney, Tom Gold, Nelson Graburn, Willam Hanks, Steve Hershler, William R. Jankowiak, David Johnson, Rosemary Joyce, Patrick Kirch, Roysei Kokubun, Hong-Yung Lee, Hy Van Luong, Laura Nader, Lili Nie, Aihwa Ong, Christian de Pee, William Schaffer, Nancy Scheper Hughes, Gavin Smith, James Watson, Diana Wong, Chen Yang, Wenhsin Yeh, Shen Yuan 以及 Li Zhang。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审员提出了极富价值和洞见的评论，促使我重新思考某些关键性的问题。这些评论对本书的写作贡献颇多，而且也将对我今后的研究有所启发。

随着时光的流转，我日渐感念于伦敦大学的 Mark Hobart 与 Elizabeth Croll 两位恩师的教导，在那里我接受了作为人类学家的初始训练。伯克利的 Hellman 家族初级教研资金，助我 1998 年夏的华南之行。1998 年至 1999 年，我参加了由日本基金会（亚洲中心）资助、日本国际部协管的亚洲领导人基金项目，这为我思考在田野中萌发的想法提供良机。



文本注释

中国测量单位换算表

长度

1 里 = 0.5 公里

1 尺 = 0.333 米

面积

1 亩 = 0.777 公顷

1 里 = 0.01 亩 = 0.1 分

重量

1 担 = 50 公斤

1 斤 = 0.5 公斤

汇率

1980 年 1 美元 = 1.5 元

1985 年 1 美元 = 2.7 元

1986 年 1 美元 = 3.5 元

1990 年 1 美元 = 4.8 元

1992 年 1 美元 = 5.5 元

1993 年 1 美元 = 5.8 元

1994 年 1 美元 = 8.6 元

1996 年 1 美元 = 8.4 元

1997 年 1 美元 = 8.3 元

1998 年 1 美元 = 8.3 元

1999 年 1 美元 = 8.2 元



闷热的夜里，一辆半新的1993年产尼桑汽车缓慢地往前开着。它保养得比较好，只不过左门有一道明显的擦痕。车子蜿蜒穿行，仿若司机在与车共舞——也许是一曲华尔兹而非探戈。这条新式的街道非常宽阔，两旁树形优美。路上行车稀少，即便它的宽度足以让十辆这样的车子并行。它行驶在街道正中，毫不理会白色车道线，仿佛司机统帅了道路或者某国元首前来访问。空荡荡的街道，似乎专供这辆尼桑通行。它速度奇慢，直至和两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并驾齐驱，她们边骑边聊，鲜亮的衣衫在微风中轻拂。一切远离匆忙：万物凝滞，悬置或等待着，在如此静寂的夜晚。

如果车内有人向外观望，想必他会惊叹于周围全新的景致。即便夜色朦胧，他依然能感触到这城市新鲜的气息，例如新栽的松树或其他树木的芬芳。它们都还年轻，只不过有的长得比较高大。路旁的新楼在树影中若隐若现，这些楼群的晦暗引人注目：某些漆黑一团；某些灯光黯淡，看上去像是烛火或手电的反照。好多楼房悄然伫立在阴影里，虽设计精美时尚，但都没有完工——并非仍在隆隆噪声中修建，而是已经停工。在投资撤离、贷款中止之后，这些建筑被废弃和遗忘，交由老天来决定命运。它们的毫无生息将原本的空间意义一笔勾销。最令人咋舌的是那些残缺的窗户，好似张开的嘴巴，将刹那间吞灭周围的飞虫。如若仔细观看，便会发现，每一张嘴都通向无底深渊。这阴暗触目惊心，显然，楼房的建成遥遥无期。由于突然停建，它们多半没有封顶，那些裸露的钢筋房梁好像灌木丛一样冒了出来。

此情此景浮现在B市的中央大道上。这座中型的沿海城市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边缘。广西素以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民族的多样性闻名，^[1]东邻广东，西南部与越南接壤。B市旅游业发达，那里的海滩非常有名。它虽不是中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但可由此走海路到达越南或海南——过去隶属广东，1990年初成为独立省份。广西省会南宁市位于B市以北，两地相距150公里。1984年，作为一项经济改革试验，中国开放了14座沿海城市（其中包括B市，这一点也许人们已经忘记），采取特惠性的经济政策招商引资。^[2]与B市相比，深圳等地的经济腾飞备受瞩目。B市经济的起步真正始自90年代初期，较深圳落后近10年。1992年至1993年，短短两年之内，B市呈现繁荣景象——由于省政府的鼓励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激发的憧憬，以国内贷款和资金为主的大量投资迅速涌入这座城市，掀起居住和办公用宅的建筑热潮。^[3]1994年，朱镕基副总理接管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现象，决定冻结全国的房地产投资。于是，各投资公司相继离开B市，撤走贷款与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银行贷款被冻结；B市的开发热度冷却，摩天大楼的修建全部中断。直到1998年，凄凉的楼群依旧是这里难愈的伤痛。

尼桑车继续行驶在中央大道的正中，无视任何交通规则。这条开阔而宁静的街道——至少在初到B市的人看来——异常地空旷，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习以为常的拥挤和喧嚣在此处荡然无存。车内共有4人。开车的人40多岁，神情难以捉摸。他手握方向盘，一只基本不动，另一只灵巧敏捷，形成有趣的对照，仿佛它们不是长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叫H，是B市某高科技企业的总经理。这家叫做BX集团的公司，成立于90年代晚期，属于全国知名企

[1] 比较广西和它的邻省广东是很有用的。1998年，广西有4675万人口，GDP为1900亿元，户均消费额2040元。广东有7143万人口，GDP为7900亿元，户均消费额4686元（国家统计局1999：62—63，72，113）。

[2] 对改革初期的情况的简要解释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的缘起，参见《中华》，1996，特别是第1234—1235页。

[3]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领导人曾接连视察B市。